一个中年人非要劝年轻人快乐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

一个45岁的中年人混进了成员平均年龄十四五岁的QQ群。

通常在晚上11点，这些群会活跃起来，中年人徐世海紧盯着屏幕上的每一条消息。

年轻人吐槽学校，聊华晨宇的歌，他一首没听过，插不上话。有人喊他“上两把”游戏，他回复：“上不了，家长管得严”，其实是不会打。他担心老“潜水”会被群友遗忘，就总发10元、20元的群红包。

只有一类发言能真正触发徐世海的行动，比如“想死”。他会马上向发言者提交好友申请，并设为“特别关注”，准备私聊。

有一次他看见有人在QQ群发了这种话，几十条怂恿和鼓励的信息随即冒出来。徐世海模仿青春期少年的语气发言：“你真傻，有什么比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更有意义吗？自杀就是胆小鬼，最后只能下地狱！”结果他被移出群聊。

徐世海曾被同一个群“踢”过6次。为了再进群，他就申请多个QQ号、借号，再找人拉自己入群，他还被当成过骗子。

在群里，他努力伪装成“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孩子”。他看年轻人发的微信朋友圈信息，学网络用语，发言时“战术性”地加上粗话。他阅读研究青少年心理的书籍，为了跟上年轻人的最新潮流，附近中学放学，他去学校大门口蹲着，听学生聊天。

群聊热闹的时候，年轻人熬夜，他也不睡觉。一看见有年轻人发“轻生”的言论，不管这言论发泄情绪的成分有多大，他都会启动“救人”模式。在现实中，徐世海做装修工程，是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员，也是位父亲。

有天深夜，一个男孩在QQ群里发了一句“再见”，爬上宿舍楼顶。徐世海陪他聊了5个小时。凌晨4点，男孩对他说，学校要出早操了，“放心，我已经想开了”。

一个湖北女孩到郑州参观动漫展，被人骗到酒店，拍下裸照，写下欠条，上面有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和父母联系方式。她不敢告诉家人，深夜在街边痛哭，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徐世海是她的网友，得知她的情况，一边在线开导她，一边帮她报警。

还有一次，一名中学生说被同桌掌握了隐私，长期被勒索，同桌拿他一学期的生活费买了手机，他说“不想活了”。

徐世海给勒索者打电话，自称是警察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听上去很稚嫩，紧张得有了哭腔。这通电话后，求助的中学生收到同桌的道歉和欠条。听徐世海的建议，他后来转学了。他对徐世海说，以后我参加工作，挣到的第一份工资就给你。

“重要的是他愿意好好活下去。”徐世海说。

去年5月12日，徐世海17岁的大儿子徐浩宇自杀了。就在前一天，徐世海还跟救援队去打捞落水老人。晚上回家，看见两个儿子正在玩游戏，“一切如常”。他记得徐浩宇给自己倒了茶，洗完衣服又拖了地。第二天早晨，他被敲门声叫醒，小区保安问，有个孩子从顶楼跳下来了，“是不是你家孩子？”

如今，在很多亲戚朋友的记忆里，徐浩宇还是阳光开朗的形象。他身高186厘米，皮肤白皙，样貌帅气。他会在爬山时帮同伴背最重的包，有同学生活费花完了，他拉着对方一起吃饭。

徐浩宇喜欢美术，他画抗疫的护士，也动手给朋友制作礼物。生前，他已经想好了未来要学服装设计或做自媒体人。他爱和家人开玩笑。认识他们一家的人说，他家里挺有“烟火气”。

徐世海回忆，翻遍儿子的遗物，也没找到他轻生的原因。那段时间，徐世海“整个人活得像是悬浮的空气”。他打开儿子的QQ号，进入儿子常去的聊天群。

那是一个他不曾了解的世界——根据他的观察，即使在一些以游戏、动漫为话题的青少年网络社交群里，也有人发和“死亡”相关的话题。包括儿子在内，不少人都看过被文旅部列入网络动漫黑名单的“暗黑漫画”。

徐世海拜托儿子的朋友、自己认识的年轻人，把他拉进类似的群里，他也进过“约死群”。

徐世海记得，有学生在群里说，想掐死某人。有人称“真的活得够够的”，群友给他详细介绍自杀的方法。还有人说，“你选对了，只有死才能解脱”。有孩子说完“我走了”，又问“你们来不来”。

徐世海想知道，自己的孩子是哪一刻作了那个决定。

在群里“潜伏”越久，他越觉得后怕。一些人会公开传递这样的思想——别指望父母、老师能帮你做什么，想改写人生，只有生命重来。这些话使得本就低落的年轻人更加绝望。

他认为，这些隐秘的角落就像“黑洞”，年轻人涉世不深，很容易被裹挟进去。

在徐世海的日常生活中，说不准何时，年轻人就会发来消息。他走路攥着手机，睡觉把手机搁在枕头边上。他从不关机，始终开着响铃提醒。

他正开车，信息来了，他会靠边停车，熄火专心陪聊。好几次，他在驾驶座上从天黑坐到天亮。有时他睡着了，手机响了，他强迫自己清醒过来，在黑暗中回复。他抽烟，手机信息一只手回不过来，他就把烟放下，常常忘了再拿起来。

有时候，他费了半天劲，让那些孩子“想通了一点”，没多久，对方的情绪又不好了。他把手机一扔，叹口气，又抓起来接着聊。

“他们压抑太久了。”徐世海说，“就像一个汽油桶，早已积满了油，就差一个火星把它引爆。”

不止一个年轻人对徐世海说过，日常烦恼几乎没有出口。一个18岁的男生告诉他，自己不开心，但父母觉得他衣食无忧，认定他无病呻吟，老师也常责备他。他自我怀疑，越来越敏感，在半年的时间里，他不断找徐世海倾诉。

和这些年轻人聊天时，徐世海觉得和去世的儿子更近了。根据他的体会，自己接触过的说着“不想活”的青少年，绝大多数都善良、懂事。他寻找儿子的影子——从小被身边人称赞“省心”，习惯把压力埋在心底，对家长“报喜不报忧”。

徐世海的大儿子徐浩宇曾在家里的小黑板上为父亲画像。 受访者供图

“别管遇到什么事，不方便跟家人说的都可以和我聊。”徐世海总是对年轻人说这句话。

他观察过一些家庭，父母自认为成了孩子的朋友，但孩子并不认可。聊天时，徐世海从不反驳年轻人的意见，他会顺着对方说，给他们发段子，帮他们出招解压，比如“把讨厌的人画成乌龟”。

有人笑他聊天“土”，他也自嘲，“我这算小偏方”。对话的人回他“哈哈哈哈”，他很高兴，觉得成功了。

他还经常做“夹在中间”的调和者。一位单亲妈妈找他，说14岁的儿子留下遗书，一心想自杀。孩子见到徐世海，第一句话是，“谁劝也没用”。

徐世海跟他单聊。最终，还是男孩红着眼睛先开口了。他和母亲、弟弟一起生活，在他看来，母亲太过追求完美，总批评他。他给弟弟做饭，做得不好也被埋怨，感觉自己一无是处。

那天，这一大一小聊了五六个小时。离开前，男孩主动加徐世海微信，后来也常找他聊天，一直没中断学业。

一次，徐世海帮朋友送孩子上补习班，那是一名初中生，周末补课到夜里11点多。在“徐叔叔”车上，男孩高声大骂父母。

徐世海两头忙活，他劝那对父母取消了大部分补习班，也劝孩子，“父母初衷是好的，但方式你不接受，再有冲突就默念‘他们爱我’”。

河南省2020年有115.8万人报名高考，约占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的11%，省内只有一所211大学。在省会郑州，幼儿园孩子学英语，初中生没周末——都是常态。徐世海觉得，学业是年轻人最大的压力来源。他回忆，儿子徐浩宇近视，去世前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晚上10点多回宿舍。

通过和年轻人聊天，徐世海发现，有一些学校让学生检举同学的日常表现，记入学期末的综合评分；不少家长经常训斥孩子，提起他们就摇头叹息。

他朋友的女儿正上初三，每晚做题到深夜，常常为作业急得大哭，会抽自己耳光，用圆规刺伤自己。这个优秀的女孩一直上“精英班”，一次考试失利掉进“普通班”，就冒出了自杀的念头。

一个上高二的女孩告诉徐世海，她是家里学历最高的，背着全家的期望。可她真的学不进去了。她请假调整状态，老师和父母急了。父亲说，“你就是在家等死”，不再给她生活费。她开始怀疑亲情。

“全国学生那么多，都去清华、北大也坐不下呀。”徐世海劝她，从学校到社会就像学开车一样，一开始谁都手生，路上人多车多，但你真上手启动了，开着开着也就成老司机了。“人生就像心电图似的，起起伏伏才是活着，一马平川不就废了。”

2020年高考前，他写了一篇《给高三孩子们的一封信》，发在社交网站，劝学生别把人生押在高考这一关。“就好比我们到了电影院，不管进去哪个放映厅，都有精彩的故事。”

徐世海出生在河南南部一个村庄，家里只供得起哥哥读书。初三没上完，他就外出打工。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，他回家参加中考，交了白卷。16岁，他来到郑州，文绉绉地记下：“马路真宽，街边的泡桐一棵拉着一棵，一排挽着一排。”

他去工地学推斗车，一车砖头200斤，装混凝土的更重。几天干下来，他手上都是泡，这些泡又变成茧。一次，他推翻了斗车，摔进水泥里。

他学会了看施工图放线，扫一眼砖垛就知道是堆了几千块，瞄一眼车就能判断装了多少立方米沙子。因为表现出众，他被老板送去学技术。他同时打过几份工，20年前就月收入过万元，逐渐在郑州站稳脚跟。

“现在的孩子不必为一点想吃的零食绞尽脑汁，不必为一件新衣服辗转难眠，也不必为一点学费忐忑不安、为一套三角尺软磨硬泡。”他在文章中写道，小儿子一周用掉的铅笔比当年自己一年用的都多。

但是，大儿子去世后，他开始理解当代孩子的压力。小儿子正读小学二年级，徐世海每天都会问问学校里的事，“开心不开心的都说说”。看到孩子不高兴，他买玩具换真心话。

他见过有家长不拿孩子的痛苦当回事，还指责孩子不懂事。当事人轻松聊起这些，徐世海则听得心情沉重。

日常生活中，他粗线条，老忘事儿，留着接近光头的圆寸，总被人调侃“一套衣服穿一季”。但对年轻人的一句话、一个举动，他都格外敏感小心。

和孩子们聊深了，他会告诉对方真实身份。他发去徐浩宇生前的照片，感叹“其实对父母来说，没什么比你们活着更重要了”。

徐世海曾在群里遇到过两个十三四岁的少年，他们互称兄弟，在群里怼人、骂脏话，说不想活了。徐世海刚劝两句，人家就让他闭嘴，他打不开局面。最后，两人说“再见了”，再没回复他。

第二天，徐世海听群里的人说，两个少年已经离世，有群友在这条消息下点赞，他则痛哭起来。

受挫不能让他死心。年轻时他就爱管闲事儿。在路边碰见临盆的产妇，把人送到医院，还把费用交了。为了帮人，他搭进去不少钱。身边的人，谁家遇到事儿都爱跟他说，小到烹制新菜，大到家里装修，他都去帮忙。在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，他出的任务不少，有时需要开长途车，连续忙好几天。

他的朋友年龄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都有，都爱去他家吃饭，还有人专门把家搬到他家附近。

徐世海算过，自己试图“救”过的年轻人有几十个。有的生活在郑州，有的在云南、贵州。有人后来工作了，当警察的、做生意的、开工厂的、送外卖的都有，还有人是“斜杠青年”，同时忙活好几份事业。

迈过人生的难关后，一些年轻人还会找他。一个短发的女生性格爽朗，她告诉徐世海，“以后可以把我当半个儿子”。

也有人最终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。徐世海理解，生活重新开始了，忘掉过去挺好的。

每过一两个月，他就会去儿子坟前，摆上儿子生前爱吃的鸡腿、爱喝的雪碧。他会对儿子念叨那些被自己救下的孩子。他想，如果当初有人拉儿子一把，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。

徐世海非常珍惜“父亲”这个身份。小时候被迫中断学业，他一度不理解父亲。和所有过于传统的中国父子一样，他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沉默寡言，鲜少与晚辈交流。

徐世海想尽力做个开明的父亲。儿子在世时，遇见烦心事，他主动敲门，“有啥解决不了的我帮你”。学校发生了“不公平”的事，儿子站出来发声，与人起了冲突，他为儿子撑腰。

徐浩宇去世后，徐世海主要精力都用来陪家人。他最关注的是青少年心理健康，一旦发现“看起来有问题”的QQ群，他就抄下群号，发给身边的家长一起举报。三四个月里，他找到的30多个群先后被处理。

他常和朋友交流与年轻人沟通的心得，他的一些朋友说，受他影响，自己也不再执着于孩子的学习成绩，会给孩子做好吃的，也会带孩子看电影放松。

如今谈起去世的儿子，徐世海会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，不时背过身去擦眼泪。他常备速效救心丸，防备想儿子想得太伤心。走在路上，看到和儿子相似的背影，他常常忍不住上前拉住对方，问一句“吃饭了没”。

在巨大的悲痛中，他依然选择在网上讲出失子故事，“让别人家参考，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”。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，他担心“小偏方”不受认可，“毕竟，很多孩子出了问题，家长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”。

又一次陷入对儿子的想念时，他会翻出年轻人发来的信息，给自己打气。一个男孩拿第一笔工资给徐世海买了礼物。一个曾请他雇人袭击父母的少年，平稳地度过了青春期，现在向他咨询该给父母买点儿什么。

让徐世海最难忘的是，有年轻人说，自己也想有个这样的爸爸。不止一个年轻人和他提过：“以后能不能叫你爸爸？”他全都拒绝了。

“无论如何，每个孩子的父亲都只有一个，别人无法取代。”徐世海说。
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文中徐浩宇为化名）

徐浩宇生前画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肖像。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/摄

那个“入狱养老”的老人去哪儿了

> 一位律师这样评价：“在法治国家，无论主观动机如何，犯罪都应得到惩治，抢劫为了反映问题、养老的做法是不可取的，也是永远不能被原谅的。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

很多人相信那是欧·亨利小说的现实版本：一个穷困潦倒的老人，为了到监狱里吃上饱饭，不惜以身试法。

2008年，69岁的湖南老人付达信的举动就是这样被媒体记录的。在北京火车站熙熙攘攘的广场上，他当众实施了一次抢劫，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。

13年后，这个老人怎么样了？

最近，在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镇，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见到了82岁的付达信。他住进了新的房子，算上养老金和特困补助，每月能领到近1000元生活费，能吃喜欢的鱼肉、面条和糯米饭。

“我现在自由了，想吃什么可以吃什么。”他笑着说。

对这样的生活，付达信表示自己从未想到。

因为“入狱养老”，这个老人的姓名成为网络百科的一个词条。他并不避讳那段经历，向不少人讲过当时的过程。

他说，当年抢劫是因为觉得“没有路走”了。作为一名“五保”老人，他当时收到的供养金是每年600元，“每天一块六毛钱，吃什么？”

2008年秋季，付达信计划制造一次抢劫来产生影响，以提高“五保”老人的待遇。

之所以选北京站，是因为那里人多，“容易引起注意”。考虑到会因抢劫入狱，他事先准备了冬衣。

2008年9月7日，付达信乘火车抵达北京站。他在车站附近花40元住了一晚旅馆，打算第二天先去参观毛主席纪念堂。抢劫则是两天后的计划。

第二天，旅馆闭门谢客，他找不到新住处，将计划提前了。吃过午饭，喝了二两北京二锅头，他提着行李回到了北京站广场。

在午后繁忙的北京站，这个身高只有1.5米、体重不到100斤的老人，并不引人注意。

虽然有所准备，真要去抢劫，他反而有些害怕。他不知道此举会被判几年刑，也不了解监狱里的生活是什么样。

付达信的第一个目标是一位警察模样的人，考虑的是“警察不打人”，但还没等他付诸行动，对方就走开了。

为了避免被男性打，他决定选择一位女士。“我看见一个女的站在窗口买票，穿蓝色衣服，拿着三五百块钱的样子，我抢了一张来。”付达信拿起一张纸，对记者比划着说，“我抢了一个角”，纸币的大半部分还在原主手里。

当时，他希望对方能喊警察，但那位女士什么都没说，带着残缺的纸币，转头继续排队。他的第一次抢劫宣告失败。

付达信只好走开。在广场西侧的花坛边，一位年轻女士从他身边走过。付达信径直上前去抢她的挎包，两人互相拉扯，僵持不下。

付达信体力不支，渐渐败下阵来。为了让对方喊来警察，他拿出水果刀晃了几下。这一次，他如愿以偿。

“我拿刀的目的是构成犯罪。”付达信对记者解释。

两个多月后，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定，付达信的抢劫行为属犯罪未遂。鉴于其“认罪态度较好”，判处其两年有期徒刑，处6000元罚金。

付达信对记者回忆，在法庭上，他对法官说：“该判多少判多少。没什么讨价还价，敢做敢当。”

他认为，自己走到那一步是迫不得已的。供养金太低，他认为社会不公，多次去讨说法。

一位律师当时这样评价：“在法治国家，无论主观动机如何，犯罪都应得到惩治，抢劫为了反映问题、养老的做法是不可取的，也是永远不能被原谅的。”

付达信在家中。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/摄

在同龄人中，付达信算是识字多的。他在1957年读完高小，考上了县里的林业中学。后来学校停办，家里没钱供他继续读书，他不得不回家种田。

年轻时，他四处打工。至今，他仍能记得那外出讨生活的种种细节：在青海修过铁路，在福建当过伐木工人，在江西做过搬运工。1986年，他在云南瑞丽的一个县城养鸭子，用挣到的钱在家里盖起一间砖瓦房。但有一次，鸭子中毒死了大半。在亲戚帮助下，他又去广西桂林卖蔬菜，干了一个月，卖不过本地摊主，亏了几千元。

56岁那年，付达信回到老家，生活日渐拮据。从2003年开始，他领取一年300元的“五保”补助，2007年这笔补助涨到600元。他认为太少。

为了谋生，他在农村集市做过一些小生意，一天能挣几元钱。村里还有他的八分地，但他觉得自己没有力气种了。

直到2008年，付达信还尝试过外出打工。他跟同乡去广西柳州收废品，没赚到钱。此时，他已69岁，未婚，对养老忧心忡忡。他的积蓄还剩2000元左右，预计“还能花一年”：“老鼠（还知道）今天把东西放在洞里，明天吃。人吃完了怎么办？”

考虑了一个月，他策划了抢劫。

如他所愿，那次抢劫引起了关注。付达信先是在看守所待了3个月，后来又被送到监狱服刑。当他入狱，不少狱友已从新闻里得知他的遭遇，对他表示了同情。

付达信记得，他的70岁生日是在监狱里度过的。那天，狱警端来鸡蛋和面条，点了蜡烛，十几位狱友给他庆生。

他不知道狱警为什么给他过生日。有犯人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待遇，狱警说，你们是什么？他是故意入狱。

付达信始终认为，自己在监狱里遇到了好人。作为监狱为数不多的老年人，他常收到狱友的礼物，奶粉、鸡蛋，出狱时他还收到10盒烟。

关于监狱生活，他记得每天都能吃上肉，除夕晚上有甜酒煮鸡蛋，正月十五有元宵供应。他被分到“老残班”，不用劳作，每天饭后去活动室看电视、看报纸，放风时去篮球场看年轻人打球，去花园散步，和狱友聊天。

他在监狱里做了人生的第一次全面体检，查出腰椎间盘突出、前列腺炎、肩周炎、脑萎缩、贫血等多种疾病。为了治疗前列腺炎，他住过监狱医院。

2010年3月，付达信提前半年出狱，比入狱前胖了十几斤。

接他出狱的是侄子付国民，村里出了500元车费。他被送到灵官镇敬老院。这是一座四合院式二层楼房，住了56名老人，两人一间。老人多在80岁以上，年龄最大的90多岁，有的住了20年。

老人每月有一笔集中供养金。如果有老人生病，敬老院会雇车将病人送去医保定点医院治疗，住院费用全免。

院长费文秀说，由于护理经费紧张，他们只能请敬老院内的其他老人照顾那些生活不能自理者。乡镇一级的敬老院急需加大对失能老人护理费用的投入，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配备无障碍卫生间。

灵官镇民政干部曾亚平介绍，灵官镇现有256位特困人员，敬老院床位很紧张。

付达信出狱后，住进了敬老院。费文秀记得，付达信喜欢看电视，偶尔跟人打打牌，输了钱要把钱赢回来才肯罢休。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后离开。他说自己牙齿掉光了，吃不惯那里的饭。他也承认，离开也是为了拿到供养金，“我出来钱就归自己了，想吃啥吃啥”。

祁东县民政局介绍，全县现有特困人员6386人，分为在家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两种供养形式。

祁东县城乡和住房建设局则介绍，根据农村危房改造政策，分散供养的特困老人可按照相关程序申请建房。现行补助标准是，县级按照每户2.6万元统筹拨付至乡镇，再由乡镇根据贫困类型、贫困程度实施差异化补助。

受惠于这项政策，付达信在侄子付国民家后面建起了一栋小平房。周围遍布农田，种着水稻、烟叶和油菜。十几只鸡叽叽喳喳跑来跑去，为防止鸡进屋，付达信在门口摆了一块木板。

盖房花费近10万元，一部分由政府补贴，其余由侄子垫付。为了省钱，房子外墙未贴瓷砖，水泥地上摆放着旧家具，装了一台空调，但付达信舍不得用。

2016年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，将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与城市“三无”人员救助制度统一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。其中提出，特困人员的标准分为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两部分，并规定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应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.3倍。

2020年，祁东县特困老人分散供养金增至每月540元，集中供养金增至每月780元。

付达信每月能拿到供养金，逢年过节还会收到慰问金。他对现在的生活表示基本满意，不过，他的一个愿望是医保覆盖面更大。他需要服用治疗冠心病、腰椎间盘突出、贫血的药品，希望这些药品都能纳入医保用药。

“活一天算一天”，他已开始就身后事做打算：花30元拍了一张照片，用相框装起来；口述了一份遗嘱，去县城打印了出来。

在遗嘱里，他交代后辈，为了省钱，办丧事不准请道士念经，不准唱夜歌，不准烧纸屋，不准用高级香烟。但要请当地最好的渔鼓班子唱两晚。这是当地一种曲艺，多在红白喜事场合演唱。“一辈子最后一次，希望给人家看看（我的事）。”遗嘱里提到他在北京的经历，并留下了报道过他的几位记者的电话，以“证明这个事件是真实的”。那是他人生中受人关注最多的时刻。

回首这一生，付达信评价自己“碌碌无为”，他将原因归结为“命运不好”，没赶上好时代，求学时错过招工，去福建伐木曾被遣回户籍地，做生意被当成过“投机倒把”。他觉得如果生在今天，自己肯定能够结婚成家，也不至于“没有工打”。

无论如何，他对安稳的晚年感到知足。

眼下，他希望保持生活自理。每天吃过早饭，他喜欢去距家一公里外的农资店坐着，与人们闲聊。很多人并不认识付达信。他只是一个看起来瘦小、温和的普通老人。